

中外名人傳

(二十三)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一一七頁）

張篤倫（一八九四—一九五八）

西昌行轅主任
湖北省政府主席
重慶特別市市長

少年列名湖北四傑

張篤倫曾是民國初年川軍要員，國民革命軍北伐收編川軍，張篤倫居間協商，功不可沒。北伐成功後，綏靖川康邊境，頗著功績。大陸變色後來台，於一九五八年病逝台北。

張篤倫，湖北安陸人，一八九四年八月十一日生，父親張以楨有商業頭腦，清末在湖北經營土地買賣及糧行，收入豐厚，可惜早逝，家道中落。在他幼年時，靠母親為人拆洗縫補，賺取微薄的工資維生。他有兩弟一妹，全靠母親雙手操勞取得工資過活，因窘可想而知。後來，清廷在湖北創辦陸軍小

學，他和萬耀煌、劉文島、蘭文蔚同是第一班的學生，畢業後升入武昌陸軍第三中學，在學期間加入同盟會，和他志同道合的同學有萬耀煌、耿丹、辜仁發等，個個雄姿英發，少年倜儻，被喻為「湖北四傑」。

陸軍第三中學畢業後，張篤倫別母離鄂，考入保定軍官學校第一期深造，一九一一年春辛亥革命爆發，十月武昌起義，革命邁向成功。張篤倫離保定軍校，搭船到上海，適逢上海光復，陳其美被推為滬軍都督，挽張篤倫留在滬軍，任都督府警衛隊隊長。不久，張篤倫仍回到武漢，出任鄂軍總司令部參謀，參加漢口對抗清軍之役。一九一二年任鄂軍第五師副官長，獲授軍階陸軍步兵中校。幹了一陣子後，張篤倫又離鄂，出任山西第一混成團步兵第一營營長。

一九一七年，湖北陸軍第八師師長石星川在荊州宣稱自主，自稱湖北靖國軍第一軍總司令，邀張篤倫任參謀長，進攻宜昌戰敗，第八師潰散，殘部改編為湖北靖國軍第一

團，由張篤倫任團長。一九一八年初，率部退入湘西，改任湖南援鄂軍第一團團長。一九二三年入四川，任四川邊防軍高級參謀，四月，北京北洋政府授其為陸軍步兵上校。一九二四年，張篤倫到廣州晉謁孫中山，從此踏上正途，服膺國民革命。

搭上劉文輝入川軍

一九二六年，北伐的革命軍進佔湖南，全國震動，原依附於吳佩孚北洋軍的川軍領導人劉湘、劉文輝叔侄，眼看北洋政權不保，主動和四川討賊軍川邊司令賴心輝言和，共商依附北伐軍。商議張篤倫為代表到湖南接洽，劉文輝是保定軍校二期生，較張篤倫晚一期，既為學長和學弟，張篤倫樂於效勞，遂到衡陽謁見蔣中正總司令，面陳川軍願望，蔣總司令遂任命楊森為第二十二軍軍長，劉文輝為第二十四軍軍長，同屬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事後，張篤倫出任漢口市公安局長，旋兼代市長。

當時北伐甫告成功，百廢待舉，軍政人員待遇甚差，張篤倫貴為代市長，卻無住屋，借住其妹夫耿丹的朋友李漢俊在武昌井巷的房子，耿丹時任第十五軍黨代表兼副軍長，由於李漢俊的關係，張篤倫認識了中共的領導人物董必武和陳潭秋，建立了相當的交情，但卻始終不做共產黨。一九二七年，張篤倫解職赴川，由劉文輝聘為駐滬代表，擔任劉文輝和國民政府的橋樑。

中原大戰走錯一步

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戰爆發，張篤倫會走錯一步棋，當時馮玉祥、閻錫山勢力浩大，加上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也反對蔣中正，唐生智在湖南生變，屬於川軍的張篤倫判斷馮閻必會大勝，乃在湖北，抓住在漢口當公安局長時的三千武裝警察，整編為第九軍，請何成濬任軍長，自任副軍長兼第一師師長，其弟張篤旻任副師長，容景芳任第二師師長。

同年七月，汪精衛、閻錫山及馮玉祥在北平召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委員會，謀成立中央政府，取代南京的蔣中正。張篤倫又代表劉文輝走了汪精衛的路子，不料事與願違，何成濬效忠蔣中正矢志不渝，容景芳和何成濬同一路子，拉走部隊，改編成第九十軍。不久，馮閻大敗，張篤倫匿居上海，閉門不出，直到兩年後，才由蔣中正安排出任軍事參議院參議及蒙藏委員會委員。

贛省治績受到重視

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央軍在贛、閩、粵、湘、鄂五省部署，圍剿江西中共蘇區，張篤倫由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接引，出任江西省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區保安司令兼專署所在地南城縣縣長。他於一九三五年四月到職，遂即雷厲風行，把專署和縣政府整理得煥然一新，並親筆書寫楹聯：

為政不在多言 快幹硬幹實幹
居官務持大禮 教民養民為民

楚北張篤倫題以自勉。

另外，在一間小禮堂的柱子上，也有一幅他自己寫的楹聯：

整舊刷新今日計
敦詩說禮百年興

字為顏體，寫得龍飛鳳舞，猶勁挺拔，見者無不讚賞。他推行南城縣政，厲行「澄清吏治，根絕貪污，轉移風氣」十二字訣。治理第八專區下轄各縣則自訂戒條：「如忤逆不孝，煙、賭、娼、早婚、抱童養媳、放青苗錢、抽鴉片煙等，都在禁戒之列，昭示各縣，共同遵守。」

張篤倫在南城縣還有兩件事，做得很得人心。

南城縣硝石區有個「地頭蛇」，名叫鄧八漁，是個前清秀才，鄉里的土紳。

鄧八漁依仗勢，橫行鄉里，無惡不作，人稱「黃斑虎」。硝石區有個叫鄧昭幼的

青年婦女，長得非常標緻，她本是鄧八漁的至親姑母，可是鄧八漁不顧這些，始則威脅利誘，與之通姦，繼則膽大包天，公開霸占為妾，因而激起鄧氏合族的公憤，被告到南城縣司法衙門。這時，身兼司法審判主任的張篤倫親自審訊，當眾宣判鄧八漁有期徒刑六年。

在當時，一般刑事案件，判六年徒刑是最嚴重的。鄧八漁上訴到南京最高司法機關，終審仍是「維持原判」四字，張篤倫秉公依法，把鄧八漁的威風大大壓了下來。從此，鄧八漁再也不敢胡作非為了。

張篤倫在南城任職時，省裡派來一名禁煙局長。到南城來主持徵收鴉片煙土稅。這位局長主張經營鴉片煙土，零躉出賣。張篤倫深知煙毒之害，甚於洪水猛獸，他堅決不同意在南城買賣煙土，斷然拒絕了這位局長的意見，並勒令這位局長「從速出境，離開第八行政區各縣」。此外，張篤倫還辦農場，安排散兵遊勇就業；撤銷花捐局，動員妓女從良；修築贛閩公路等。他還開辦政治講習班，將所有的鄉鎮幹事，一批批地調到政治講習班受訓，每周內，必親自與學員見面，訓話一次。他常告誡學員，要講「禮義廉恥，要知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用這些先賢遺訓來教育勉勵每個學員。

一九三五年五月，張篤倫調任貴州省第五區（駐桐梓）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九月，再調任陝西第六區（駐漢中）行政督

察專員兼南鄭縣縣長。張篤倫調陝西省時，初由省主席邵力子派為五區專員（駐安康）。不過，中央認為漢中係鄂甘川陝四省要衝，改派張篤倫前往。

到漢中專署以後，張篤倫首先由改革吏

治入手。他令漢中所屬的南鄭、城固、洋縣、西鄉等十二縣，裁汰差役，清除腐敗風氣。過去各縣差役繁多，借機勒索良民。張篤倫不與劣紳往來，大力裁汰役夫爪牙，改設政務警察隊，擔任政令傳送之責。同時裁撤兼南鄭縣公安、財政、教育、建設四局，改設助理員，集中縣府辦公，歸科指導，各助理員一律不對外行文。在漢中任上，張篤倫還先後推行一些利民、便民措施。他用兩年時間，在漢中禁種鴉片煙苗。在南鄭，開辦土地陳報，經過查丈，繪製圖表，廢除舊制，改建新制。他曾頒令各縣，撤銷各區團公所與村里長制，減輕人民負擔。

南京國民政府軍委會為加速軍運交通，特派張篤倫兼任督修專員，修建西（安）漢（中）、漢（中）白（沙）、漢（中）寧（強）三條公路。雖任務緊迫，工程艱巨，但由於實行行政與技術配合，公路很快竣工。張篤倫曾受到國民政府獎勉。

一九三八年九月，張篤倫改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辦公廳副廳長。

抗戰軍事逆轉後，南京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劃出由原屬西康的十九縣，原屬四川七縣和寧屬八縣，共卅四個縣建立西康省，派

劉文輝任省主席，四川則由張群接任省主席。同時，在西南部要地西昌設置軍委會委員長行轅，派張篤倫中將任行轅主任。

駐節西昌制劉文輝

一九三九年一月，張篤倫到西昌就任，年僅四十五歲，他身材魁偉，目光炯炯有神，聲音宏亮，擅長演講，有儒將風度。行轅離張篤倫居住的望遠室有兩公里許，他每天上班，騎一匹高頭大馬，一個馬夫和一馬弁隨行。路過行轅官員，不論官階高低，總是笑容滿面。有部下或士兵向他敬禮，他總是先還禮，然後點點頭，揚鞭而去。

行轅每星期一舉行總理紀念週。星期六在大禮堂開文藝晚會，演出平劇、話劇、魔術、武術等等。他同夫人沈綬箴坐在前排，還不時詢問觀劇的下屬：「很好嗎？」顯得很輕鬆，平易近人，深得部屬歡心。

張篤倫在西昌行轅，宣稱他的主要任務是「宣揚中央德意和加強抗戰基地建設」兩大任務。後者和省主席劉文輝的工作息息相關，劉文輝不甘示弱，也設立西康省寧屬屯墾委員會，由劉自兼主任委員，實在不屯不墾，完全是派在各地的機構，作為自己的耳目，派親信原川康邊防總指揮部機要處處長杜履謙為秘書長，對外重要行文皆以劉文輝的名義出之，意欲使張篤倫有所顧忌。然而張篤倫不是省油的燈，他的重要行文，乾脆用蔣中正的名章行事，反而使杜履謙不能不

有所顧忌。但是在有關場合，張篤倫一再聲言：「劉文輝主席是我的老長官，我是他的舊部下，我到西昌，一切都為劉的省府服務。」兩人表面合作，暗中較勁。

劉文輝經營四川多年，掌握了當地少數民族的上層實力人物，如在喜德的靖邊司令鄧文富，鄧是漢人，外貌和生活習性卻酷似彝族，深得彝人喜愛。自一九一九年隨蔣安廷的部隊以營長身分到川邊後，一直辦理彝務，本人握有精銳兩個團，另可機動調遣彝人武裝數萬人，是劉文輝主政西康的一大支柱。然而西康建省後，劉僅委鄧文富為寧屬靖邊司令，只給名義不給錢。張篤倫到西昌行轅後，以開發寧屬為由，派鄧文富為行轅中將參議，寧屬紳豪及彝族首領各委以參議、諮議等頭銜。又派行轅政治特派員張敦品及參謀劉華冕等人到彝區籌劃，卒把鄧文富這支武力置於自己身邊。

但是劉文輝的代理人杜履謙不滿鄧文富見異思遷，調虎離山，命令鄧文富率部赴會理、寧南邊界剿辦彝族土匪蔡金萬部，又令普昭彝務指揮金安仁及鄧的死敵瓦渣支彝人部隊，偷襲鄧的根據地甘相營。張篤倫獲得情報後，立即通知鄧的老婆呂仙，並勸阻鄧的進兵，鄧文富獲上情後，大罵劉文輝。張篤倫為拉緊鄧文富，想到聯姻的招數，鄧的女兒鄧德芳當時年方十八，聰明伶俐，極受父母寵愛。張篤倫的第三子張宏基，二十二歲，中央軍校十七期畢業，留在父親

身邊，於是張篤倫向鄧文富（秀廷）提出求親，鄧妻聞訊喜不自勝，但鄧文富有所顧忌，到死都沒有答應。

日寇投降後，一九四五年九月廿七日，蔣中正偕夫人由重慶飛抵西昌視察，指揮撤換雲南省主席龍雲事件，一連住了十天，對張篤倫的治績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於蔣夫人宋美齡偕行，張篤倫夫人沈綬箴出面接待，特請蔣中正夫人宋美齡到西昌風景區的邛海遊湖，到邛海前先安置鄧秀廷夫人鄧呂仙與女兒鄧德芳在邛海海濱新村北樓等著。沈綬箴連忙向宋美齡介紹：「這是鄧秀廷司令的妻子和女兒，他們本想到行館謁見，但鄉下人無此膽量，今天他們聽說夫人遊湖，所以在此恭候，希望一見問安是他們的福氣。」說著上船，宋美齡拉著鄧德芳的手問：「多大年紀？」鄧德芳囁囁未即作答。鄧呂仙接過去說：「不小啦，十八了！」又問：「說了婆家沒有？」鄧呂仙回答的聲調似乎是悲哀的：「以前人做媒給張主任的少爺，後來因有人破壞就擱下來了。」宋美齡道：「給張主任的兒子很好嘛，我來作媒。」沈綬箴、鄧呂仙都巴不得，當下兩人心花怒放，同說：「有夫人作主就好了！」十月四日，蔣中正夫婦駕臨遠望室，為張、鄧聯姻福證訂婚典禮。蔣中正、宋美齡題了「五世其昌」、「百年好合」的鏡屏。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國民政府任命張篤倫為重慶市市長。

張篤倫當上陪都市長後，強調地方自治，推行「民主憲政」，並自兼重慶市地方行政幹部訓練所所長，親筆題「清慎勤政、公平廉正」八字為訓練所所訓。

張篤倫在國民黨財政艱難中，會同市參議會各界人士，籌集基金，於短時間內，在重慶市中心建立起一座壯觀的「抗戰勝利紀念碑」，碑高二十七米五，八角柱形，外飾浮雕，內有旋梯，頂的四周立有標準時鐘，由張群題寫碑文。

張篤倫任重慶市長，和市參議長胡子昂相處極好，一切市政先和參議會協商，取得決議後付諸實施，手法相當民主。後來胡子昂競選立法委員，由張篤倫協助順利當選。一九四九年四川陷共，胡子昂留在四川，一度謀勸降張篤倫未果。一九八九年胡子昂還撰文「懷念老友張篤倫」，表達他對張的思念。

臨危任湖北省主席

一九四八年春，張篤倫調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但此時戰局已告靡爛，共軍劉鄧大軍虎視眈眈。張篤倫擬在鄂西設行署，倘武漢不守，即遷恩施，可是他的計劃被指為渙散軍心，方案只好告吹。而桂系的白崇禧倡行「六省聯防自治」，擺明姿態要迫蔣中正下台，讓位副總統李宗仁。這樣的局面，使張篤倫極感困擾。恰在這時，張群調任西南軍政長官，邀張篤倫出任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

秘書長，他求之不得，立即赴重慶任職，但已難有作為，大陸陷共前，他的妻兒已先到香港，張篤倫也在重慶陷共前到達香港。不久，轉赴台灣，到台北後，張篤倫脫離軍政界，閉門賦閒，直到一九五八年病逝，年六十五歲。（康僑撰）

徐堪（一八八七—一九六九）

國民政府糧食部長

財政部部長

中央銀行總裁

國民大會代表

徐堪，字可亭，四川省三台縣人，一八八七年清光緒十三年民國前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生，祖父及父親均以教讀為業，徐堪自幼即在家塾就讀，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應歲試，得中秀才，時年十七歲。未幾，清廷詔廢科舉，改設學校。光緒三十二年春，四川總督在成都設立通省師範學校，招考學生三百名，規定以舉人、貢生、秀才、監生為應考資格，不限年齡。徐堪應考獲取，名列第八，同年七月入學，學費由本縣繳納。成都人文薈萃，此時革命思潮已激盪於青年學生間。成都高等學堂、鐵道學堂、優級師範學堂及通省師範學堂，尤為鼓吹革命之大本營。徐堪與各校同學王茂蘭、潘子敏、盧師諦、張夷伯等十餘人，經常假成都北門第二小學集會，討論時事，進而提出革命主張

，互相辯論，思想既趨一致，遂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先後加入中國同盟會。

光緒三十三年即民國紀元前五年，亦即

孫中山在東京成立同盟會之第三年，孫中山派黃樹中由東京返川，在成都成立四川支部，徐堪加盟。同年九月，同盟會四川支部以十月十日為西太后生辰，屆時全城文武官吏自總督以次均將齊集萬壽宮賀壽，欲乘機予以聚斂，決集全川同志於是日在成都起義，不幸事洩，楊維等六人被捕，即世所謂「成都六君子之役」。其餘多被通緝，徐堪則被迫退學，更易姓名，先逃陝西鳳翔、西安等地，次逃湖北，入武昌閱馬廠工藝局為織染工人，以避人耳目。月薪八元，僅足餬口，備嘗艱苦。

宣統元年，川中官府查緝較弛，徐堪應川中同志約返川，考入四川高等警官學堂，潛負聯絡軍警之責。宣統三年四月，四川保路風潮發生，川中黨人決定轉化保路運動為排滿革命運動，徐堪亦參加四川保路同志會，奉命赴川北各縣密謀起義。同年十月一日蜀軍政府成立，徐堪任蜀軍第四標統帶兵官。民國元年三月，調任夔州關監督。二年秋，參加二次革命討袁失敗，逃亡上海。四年冬奉命回川策動民軍，響應護法討袁軍事。五年，因遭祖父喪，以其父早先棄世，乃以承重孫返家守制。七年，出任川滇黔靖國聯軍第一路總司令部軍需處長兼江北縣知事。八年，四川改選國會眾議院議員二名，徐堪

當選。十年赴廣州，出席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此為徐堪在國民政府北伐以前奔走革命之大略情形。

民國十六年，京滬底定，四月，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同年冬，財政部在上海成立金融監理局，徐堪出任副局長。十七年十一月，改調財政部錢幣司長。二十四年五月，昇任常務次長，仍兼司長。二十八年，兼任中國、中央、交通、農民四家銀行聯合總處秘書長，解除兼錢幣司長職，二十九年改任財政部政務次長。至三十年六月出任糧食部部長，先後在財政部服務達十五年之久。國府初建，一切財政金融之創制，徐堪無不參與籌議或躬親主持。其中籌劃實施法幣一事，尤屬我國近代財政金融上之一重大改革，為支持八年對日抗戰終獲最後勝利所切關。在未實施法幣政策以前，我國幣制紊亂，財政經濟，備受影響。當時採行多元發行制度，私營銀行，亦獲得發行特權，多達數十家，以是紙幣泛濫。如遇緊急情勢發生，存戶爭求兌現，則經濟財政上之土崩瓦解，將立即實現，尤為可慮。故在民國二十四年春，蔣中正委員長銜時局，知對日戰事，不可避免，對財政部函電頻繁，命令積極準備幣制及財政之改革，以支持長期抗戰，財政部遂以此策劃之任，責之徐堪。當時徐堪勞心焦思情形，見於其所撰自述略謂：民國二十四年夏奉命實行籌畫。為得清靜環境，從事思索，在南京鍾山遺族學校後，撥得住宅一所

每晨六時，徘徊默思當時金融財政狀況，發展經濟、擴充稅收。愈思固結愈多，自提問題自為解答，寢食均廢。其初亦嘗考慮實行金本位制與虛金本位制，均難適合現況。最後乃根據孫中山錢幣革命之理論，實施法幣，對內不兌現；然必須確立信用，除以現金為準備外，一切完糧納稅均用之，示民大信。對外則無限制買賣外匯，以穩定匯價。於是豁然貫通，乃擬定實施法幣政策六條，於六月三日定稿。此項實施辦法，經財政部孔部長祥熙轉呈核定，於同年十一月四日公布施行。法幣政策實施後所獲效果，就金融方面言：由於對外匯率之穩定，外匯與標金之投機消滅，資金運用遂得納入正軌。就產業方面言：因法幣匯價稍稍落低，各地物價均溫和上昇，工商各業皆呈繁榮之象。就國防經濟言：由於幣制之統一，戰時財政得以從容應付。日本人嘗謂：中國如無一九三五年之法幣政策，則無一九三七年之抗戰。於此可見法幣政策之重要性，而徐堪策劃之功為不可沒。

對日抗戰發生，最後勝利之爭取，有賴足食足兵。足食亦即糧食問題，我國以農立國，最初二三年，問題尚不甚嚴重。但自民國二十九年以後，國內經濟情勢，因戰區擴大戰爭延長發生變化，物價糧價相繼上漲；糧食關係軍糧民食，尤待急切解決。田賦在昔原有本色之徵，如能恢復舊制，大量掌握實物，不特糧食供應、糧價控制易於著手，

對於戰時財政經濟亦大有裨益。政府因於民國三十年四月決議，將各省田賦暫歸中央接管，徵收實物，於同年七月一日成立糧食部，任徐堪為部長，負起艱鉅任務。糧政創始於抗戰緊張之會，徐堪自確立制度，成立機構，至督導實施，莫不躬親致力，肆應咸宜。從民國三十年度開始至三十四年度，五年之間，統計田賦征實征購征借，共得谷麥二億六千零一十一萬市石之鉅。軍糧民食，賴以調節無缺，此在支持抗戰上之貢獻，誠非言語所可形容。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徐堪調任國民政府主計長。三十六年十一月，在原籍三台縣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三十七年十月，調任財政部長。三十八年三月行政院改組，交卸財政職務。同年六月再任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十月，辭去財部及央行職務。自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國內局勢急遽逆轉。在此三、四年中，徐堪主持全國計政財政，嘗自謂曾竭盡其心力，而竟無補於大局，引為遺憾。

大陸變色後，徐堪曾一度寄居香港、美國，旋返臺北定居，任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大代表全國聯誼會常務幹事等職。於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病逝臺北市，享年八十三歲。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五日，蔣中正總統明令褒揚，令云：「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徐堪，早歲加入同盟，贊襄成都起義之役。北伐

以後，歷任財政部錢幣司司長、財政部常務次長及政務次長、糧食部部長、主計長、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總裁等職。時會艱危，迭膺重寄，殫精竭慮，籌策多勞，茲聞病逝，悼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昭往績。此令！」（參採國民大會逝世代表傳略，龔祖遂撰）

孫德中（一八九九—一九六七）

書香門第革命世家

孫德中號石功，浙江省天台縣人，一八九九年民國前十三年（光緒廿五年）生於城西杏莊里，門無車馬，室有詩書，人稱「書香門第」又稱「革命世家」。先世為抗元，自富陽姚江遷入天台，已歷七百餘年，追本溯源，孫家祖先原姓田，而田姓亦由周代陳歷公在楚國為大夫的兒子陳完，避難去齊國後改姓田；田完的六世孫第三公子田書，字子占，齊大夫，由齊景公賜姓孫，距今已二千五百多年。後孫姓春秋戰國時，有孫武、孫臏著「孫氏兵法」，漢末孫堅、孫權父子建帝業，即姚江一派的始祖，又晉有詩人孫綽，唐有藥王孫思邈，書法家孫過庭，宋有詞人孫光憲，明有兵部尚書孫承宗，清有學者孫星衍、孫詒治。民國有國父孫中山，均為傑出之代表人物。

孫德中的父親孫壽祺係遜清優貢（科舉

第一名）因懷於清廷喪權辱國列強侵凌，憤而與弟壽璜東渡日本卒業早稻田大學，參加中國革命同盟會，因與孫中山同姓又同號，逸仙，遂改字翼星，返國後任三台書院學監，暗助革命，家藏孫中山親筆函牘多件。民國肇建，為浙江省添購槍械，面謁孫大總統於南京。後考取民國第一屆縣知事，歷署浙江太平（即溫嶺縣）湖北公安枝江、應城等縣知事（縣長），以廉能愛民著稱，德中幼受庭訓，知書達禮，鄉人咸稱書香子弟，究竟不同凡響。

五四運動大展身手

民國八年北洋政府因循日本及親日派要求訓令巴黎和會代表放棄有關德國租借青島權益，由日本繼承，因而爆發「五四運動」，德中與北大同學羅家倫等首先發起街頭宣傳，要求「還我青島」並主張「內除國賊」「外爭主權」通電全國及巴黎和會代表拒簽和約；於是群情激憤於遊行至北京石大人胡同，曹汝霖宅時，高呼「打倒賣國賊」，並破門而入，搗毀並放火焚屋，大批軍警趕到後，孫德中與北大同學二十人立遭逮捕，舉國譁然，天津、上海、廣州各地響應，北洋政府鎮壓無效。不久，全國罷工罷市罷課聲援，北京北洋政府為平息眾憤，不得已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並由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保釋被捕學生了事。中國巴黎和會代表亦因學生愛國運動之支援，終於拒

簽和約，我國不久也接收德國膠州之租借地，五四運動全國各界所共同努力者，終於達到目的。孫德中爲此次運動之主要份子。先是德中並與傅啓學等組織「孫文學會」社團於北京大學，宣揚三民主義，並響應國民革命軍北伐，參加中國國民黨開展黨務，頗與有力，不愧爲革命世家之子弟。

留學美國杜威高足

北京大學英語系畢業後，孫德中再入北京師範大學攻讀教育，畢業後任浙江省立第六中學校長，時原配曹燕去世，續娶其妹小燕（曉疇）時效仿蔡元培校長續娶方式，於天台縣文華小學內舉行文明結婚，禮堂正中懸紅幛綴「孔子」二字，午後以茶會代鬧房，一時傳爲佳話，在天台乃爲開風氣之先，民國十七年北伐告成，全國統一，德中考取公費留學，畢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教育碩士學位爲美國近代大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之高足，旋又入英國倫敦大學皇家學院選讀。民國二十年奉命考察歐陸各國大學設施後返國，奉派中央宣傳部專門委員兼中國電影事業委員會委員與葉楚傖共事並交往密切。旋經劉季洪堅邀任河南大學教務長，因夫人水土不服，辭職返南京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兼中央政治學校教授，旋又應聘南通學院教務長，迨七七事變，八一三全面抗日滬戰開始，始避難返國。

創辦學校安輯流亡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全面抗戰，德中攜眷返鄉避難，京滬大學多隨政府內遷，甚多教授及戰區青年，多往內地或山區避難，德中循鄉人之請並爲安置失業教授與流亡青年學生，於家鄉創辦天台中學高中部，擴建操場，建新校舍大樓，功在桑梓。今爲鄉人所稱頌。校內並建有紀念浮雕碑文以表追思。民國二十九年，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楙奉命創設省立英士大學於浙東麗水，敦聘德中任教授兼訓導長，對安置流亡學生，功不可沒，是時共產黨徒到處煽惑青年，德中力闢邪說諷詞，安定戰區人心士氣，功在黨國。

堅決反對焦土政策

抗戰初期，中樞政要汪兆銘（精衛，後降日）主張「焦土抗戰」，擬將華北及東南之工業設備及居民，盡數撤往西北，實行堅壁清野政策，盡行破壞交通及重要設施如橋樑、倉庫、鐵路運輸等工具及設備免資敵用，乃至主張自決河堤海塘以阻敵軍前進。是時防衛金山衛之第十集團軍之第六十三師，欲掘錢塘江之海塘，用決口以阻擋日軍，及至杭州淪陷前夕，「別動隊」於杭州市內劃分地區，貼上符號，準備了火油、木材等放火材料決定「焦土抗戰」，浙江各界人士紛表反對，孫德中反對尤力，撰「論焦土政策」一文，並與地方人士面謁省主席朱家驊

，咸認「將自己城市付之一炬，受損失者還是自己的人民，我們終有回來之一天。」朱家驊從善如流，以兼保安司令命令嚴予制止。（見朱家驊治喪會印發之「生平事略」）而孫德中之論文反覆申述「焦土」之目的在斷敵餉械，絕敵應援，堅壁清野爲待敵疲退，乘機逐擊。所謂「清野」用在「堅壁」也，「壁」既不得而「堅」，則「野」焉用乎清？剖析「焦土政策」之利弊得失，至爲精闢。文亦擲地有聲。爲抗日戰爭之重要文獻。惜中樞主政諸公未能深思熟慮，其後乃有黃河花園口之決堤及長沙大火之舉，民命財物損失，無法估計，爲神聖之抗戰抹上無可諱言之敗筆，誠令人嘆息！

抗戰復員建軍建國

民國三十二年，德中間關入川，於重慶應梁寒操之聘任中央宣傳部普通宣傳處長，兼任中央幹部學校教授，三十三年應蔣經國委派出任青年軍編練總監政治部組長，旋任青年軍第六軍少將政治部主任。軍長劉安祺甚倚重之，交情莫逆。三十四年八月日寇宣佈無條件投降；撰「青年軍何時復員？」「建軍與建國」等文，闡述建軍與建國之關係，主張建立預備軍官制度，對安定青年軍學生之軍心士氣，卓有貢獻。今日台灣之大專暑訓及預官制度即由來於此。德中任職軍中時，曾蒙蔣中正主席召見垂詢合影留念。並頒給抗日勳章。

桴海來台盡瘁教育

民國三十五年，台灣重歸祖國，德中於青年軍復員後應許恪士之聘，桴海來台執教於省立台灣師範學院及台灣大學，培育人材不遺餘力。並應各縣市教育會之邀請，巡迴講學作育英才無數。五十六年病逝於台灣大學附屬醫院，享年六十九歲。一葬於陽明山公墓，蔣中正題「教績永彰」輓額。遺著有「抗戰與我國教育之前途」、「蔡元培教育學說」。輯有「蔡元培德育講義」、「蔡元培遺文類鈔」，並有志編纂「蔡元培全集」惜天不假年，遺命其侄孫常焯編輯成之。(孫常焯撰)

羅慕洛 (一八九八—一九八五)

菲律賓大學校長
菲律賓外交部長

菲律賓外交家羅慕洛是世界級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以他的聲望和地位，如果出面競選菲律賓總統，無人能與爭鋒。但他一直謙讓，不當總統，但任何一位總統，都不能沒有他當外交部長，所以他的外交部長自一九四六年起，一直做到一九八三年，八十五歲高齡時才退休，時間長達三十八年。

羅慕洛於一八九八年一月十四日生於呂宋島中部小鎮塔爾瓦克，父親是當地的縣長，自幼即受良好教育，由小學、中學、大學

到研究院，順利升學。二十餘歲時，即受聘為國立菲律賓大學教授，後來接任菲律賓大學校長。太平洋大戰爆發前，他是報人，擔任菲律賓前鋒報社長，曾以高瞻遠矚的眼光撰文警告日本，促日本勿掀起太平洋戰爭。此文使羅慕洛獲得美國普立茲新聞獎。太平洋戰爭爆發，他出任太平洋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的副官，隨麥帥出入火線，生死與共，積功升至准將。麥帥重回菲律賓，登陸雪伊泰時，他陪在身邊。當處長後，仍被人稱為將軍。

一九四六年，聯合國成立，有五十四個國家的代表在舊金山簽署聯合國憲章，遠東地區只有羅慕洛和中國的顧維鈞。他曾兩度當選聯合國安理會主席。他言辭犀利，雄辯滔滔，精彩的演說，博得舉世讚佩。在中華民國退出大陸後，他為維護自由民主，在聯合國和中華民國代表並肩作戰，對於保護我聯合國代表權，仗義助拳，功不可沒。最後中華民國雖被迫退出，但為非戰之罪。羅慕洛的友情，一直受國人敬重。

羅慕洛的第二任妻子柏蒂斯是美國人，依照菲律賓法律，外交官不能和外國人結婚，但羅慕洛例外，原因是他對菲律賓的忠誠，無懈可擊，他的原配於一九六八年去世，他本無意續絃，但因有總統馬可仕作媒，才在一九八〇年，以八十歲的高齡再入洞房，迎娶美國女作家柏蒂斯為妻，柏蒂斯是位頗著時譽的作家，出過二十八本書，而羅慕洛

本人只出過十八本書，自愧不如夫人。八十五歲時，羅慕洛向馬可仕兩度辭職，終告獲准。在為國家服務近六十年後退出公職，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說：「今後要換換口味，做一個旁觀者，讀讀書，寫寫回憶錄，或許將來可趕上內人的腳步。」(指寫書)。

羅慕洛是一位職業外交家，擅長外交活動和演說，交遊廣闊，朋友散佈世界各國，在國際間有極高的名望。他的演說邏輯嚴謹，有煽動性和說服力。他經常在國際論壇上舌戰群雄，滔滔不絕。他的才幹、學識、膽識和待人接物的風度，讓人佩服得五體投地，被尊為世界級的幹才和偉人。他在聯合國不僅只代表菲律賓，他常常為亞洲人發言，為東南亞發言，所以被視為東南亞和亞洲的代言人。

他惟一的遺憾是身裁不高，只有一百五十公分，他常常自我調侃：「我的身裁太矮，如果倫敦蠟像館要做我的蠟像，把我擺在法國領袖拿破崙身邊最為恰當，否則，他們要把我加高一些才好！」

羅慕洛不抽煙、不喝酒，生活嚴謹而規律，每天早晨游泳，早睡早起，清晨五時即起，騎自行車數公里健身，然後在自家庭院中慢跑，身體發熱後，入游泳池游泳，由於長時期鍛鍊，所以八十歲時的羅慕洛，外表看來仍如六十許人，精力充沛，處理公務絲毫不苟，以致屢次辭職，總統馬可仕皆不批准，直到八十五歲才獲准退休。

羅慕洛有四個兒子，長子在一次飛行事故中喪生，其餘三子分別是學者、教授和律師，也有孫子數人，平日生活在一起，在兒孫面前，他不是嚴父，他是個慈祥、溫和而幽默的父親及祖父，極受敬愛。

長期獻身工作，羅慕洛自稱為「機械人」，作息一成不變，數十年如一日。然而人是血肉之軀，難免生老病死。一九八〇年羅慕洛動過外科手術，割除膽結石，手術後，很快的即恢復健康，八十餘老叟有此體能，連醫生都大感驚奇。但是三年後，羅慕洛的健康急轉直下，先是腎臟病，以透析術醫治兩年，時壞時癒。後來患腸阻塞，動手術切除後，距他的八十七歲生日僅差一個月卻告辭世。他去世的消息傳出後，美國駐菲大使鮑斯渥斯在一項聲明中稱讚他是「二十世紀真正偉大的政治家。」（劉先軍撰）

安德烈·季得 (一八六九—一九五二)

巴黎大學法律系教授

曾任巴黎大學法律系教授，在世界文壇上享有盛名的安德烈·季得，向來對政治、社會問題極感興趣。

從早期的作品「大地糧食」（一八九七）及「非道德主義者」（一九〇二）出版之後，季得曾先後擔任法國卡爾瓦多斯省洛克區區長及魯昂省法院的陪審團員。對於當時

法國法律制度的缺失及無法抑止的社會罪惡，季得也在後來的作品中「重罪法庭的回憶」（一九一三）作了一針見血的批評。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季得投身於「法國比利時之家」，援助受戰爭迫害的難民。大戰結束後，他極力申揚締造德法兩國友好關係的重要性，同時對於歐洲知識文明的重建，季得的貢獻更有目共睹，一九二四年，「克里登」出版後，季得即以「同性戀的擁護者」而名噪一時；接著，「如果麥子不死」的發行（一九二六），季得搖身一變成爲同性戀者的發言人，在大眾的眼裡，季得不僅是大文豪，同時也是爲同性戀者生存而奮鬥的戰士。

一九二五年六月至一九二六年五月，季得在攝影師馬克·阿雷格雷（Marc Allégret）的陪同下，完成了第一次法國殖民地之旅。在這次行程中，季得對於在殖民地裡享有特權的人力對當地人名的壓榨，深感悲痛與憤恨，他決定爲這些無力反抗的受辱者發言。「剛果之旅」（一九二七）及「乍得的歸程」（一九二八）便是在正義的吶喊中誕生的。雖然，季得在書中並沒有明顯地表示對殖民政體存在的看法，但他對於殖民系統卻毫不留情地提出控訴。由於季得對殖民地生活的揭露造成極大的回響，一九二七年，在法國眾議院的議會中，殖民地的問題便成了議員們討論的問題中心。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季得公開地

表明對俄國及共產主義的支持態度。在雜誌「法國新回顧」中，季得表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國家是一個沒有宗教存在的政體。事實上，季得的出發點完全是出於個人的道德意識。面對社會正義的喪失及天主教義的被扭曲，季得道出了自己無奈的心聲：首先，他拒絕履行所有的軍事義務，接著，希特勒掌權之後，季得以年近六十五歲的高齡開始投入反法西斯主義的陣營。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季得參加了「革命藝術作家協會」的示威遊行。公開反對納粹主義的高揚。一九三五年，他主持在巴黎展開的國際作家聯合大會，爲文化的延續而奮鬥。

儘管季得對俄國有無限的仰慕之情，但他對於俄國藝術理念，採取了激烈的反對態度。不過，俄國並沒有因此否定季得在文壇上的奉獻及努力，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他應俄國官方之邀參加俄國名作家高爾基的喪禮。在莫斯科紅色廣場，季得發表了一席感人的演說，對高爾基的成就大力讚揚。在俄國逗留了兩個多月，季得回到了法國，並決定將他在俄國所見所聞訴諸於大眾。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俄國歸程」的出版道出了季得對共產制度的失望。俄國在史達林的領導下，呈現的只是守舊的社會制度及道德泯沒。他對俄國社會制度的批判，引起了共產主義者的抨擊。一九三七年六月，季得出版了「俄國歸程的修飾」，正式地表示自己將和共產主義永別的心情。

自一九三六年元月起，季得即和「星期五」月刊有密切的合作，然而，自「俄國歸程的修飾」出版後，「星期五」雜誌，一直被大眾公認為最佳的思想發表園地，斷然地拒絕季得在雜誌上發表心聲。脫離共產主義思想的圈子，季得面臨的是被孤立及排擠的狀態，但是，他並沒有投向「左派」，尋找立足之地。一直到季得的妻子去世後，他才正式退休，專注於寫作。二次大戰爆發前夕，季得發表了自一八八九至一九三九年的日記。二次大戰期間，季得定居在尼斯，一九四二年，他前往突尼斯，接著，一九四三年五月再到阿爾及利亞。戴高樂將軍對季得的才華及人格相當欣賞，當然，他的文學成就

是舉世認可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諾貝爾文學獎的獎座頒獎給季得，便是最好的證明。

引譯於「法國知識分子字典」（吳融樂撰）

龔德柏（一八九一—一九八〇）

北京大同晚報社長

南京救國日報社長

國民大會代表

龔德柏，字次筠，湖南瀘溪人，生於民前二十一年清光緒十七（一八九一）年八月九日，世代書香，父親龔本璋，生子女七人，龔氏排行第二，六歲啓蒙，由父親龔本璋

親自教學，及長從師習經史，年十五、六，文事大通，時科舉初廢，教師嘆說：如早三年，必然輕易考取秀才。光緒三十四（一九〇八）年龔氏十七歲時就讀辰州中學，學校多黑幕，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時同學選他為請願代表，到知府衙門交涉，觸怒知府景芳旭竟被開除學籍，乃轉入長沙明德學校，受知恩師胡子靖，學業大有進步。

民國成立，瀘溪縣知事熊封，魚肉地方，縣民憤起驅逐，熊某誣以民變，省議發兵鎮壓，龔氏力辯事實，上書抗爭，桑梓得免一場殺伐。民國二年入高等工業學校採礦科，當年夏天以湖南官費留日，前往東京。民國四年九月考入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驚訝日政府之野心，日使石井菊次郎遊美時，發表其東亞「門羅主義」宣言，強調日本在華獨佔利益，龔氏大為憤慨，與同學阮湘，連絡數百留日學生，遊行請願抗議，不遂釀成衝突，消息傳遍國內外，繼發起誅漢奸會，檢舉殷汝耕等，後殷果為漢奸。

民國七年，段祺瑞與日本簽軍事協定，允日軍經東北以援捷克，龔氏與同學羅增益等聯合全體留日學生，返國請願，得知段祺瑞乃欲誘日、俄互鬥，「以夷制夷」之策，由此堅定其後抗日戰略思想。

民國八年，日本學生於東京組織「亞細亞學生會」，爭取巴黎和會有利於日本之談判，組「全留日同學總會」以資對抗，揭發日人陰謀，被擁為全留日學生領袖。同年四

月，公使章宗祥奉召返國，時安福系媚日賣國，東京日人歡送行列上萬，龔氏與吳一峰發動學生千餘人，亦潛在送行之內，到時高呼「打倒賣國賊」，使章宗祥狼狽不堪，消息傳入北京，與巴黎和會交涉失敗，同日刊出新聞，此乃激發國內「五四運動」之先聲。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五七國恥紀念，龔氏領導留日同學於東京遊行示威，分十路出發，曾遭日警鎮壓，同學十餘人且被捕，龔氏奮力突圍，一一救出被捕同學。旋竟以領導學生肇事為校方以留級處分，校內嚴加監管，乃於校外指揮中國留學生反日，政府派員到日，警告無效，撤銷龔氏公費，龔氏節衣縮食仍從事他的反日運動如故。旋受聘為「中日通訊社」編輯，並任天津「泰晤士報」駐東京記者，更獲恩師胡子靖激勵，勇氣百倍，遂專心研究日本問題，蒐集日人侵華資料與政情，致受日警跟踪監視者七、八載，且極盡威迫利誘，龔氏不顧一切，我行我素，成為中國通曉日本問題之第一人。為後來抗日屢助王芃生偵察日軍陰謀行動之有力導引。

民國九年，全國學生聯合會召開於上海，龔氏當選留日學生代表，到上海，復獲選為大會議長，主持大會，通電忠告吳佩孚，擊敗皖系首腦段祺瑞，北洋分裂，為革命軍北伐創造勝利之先決條件。在上海會拒陳獨秀之邀，斥以非類。其後，譯有日人所著「菊之根兮」、「蹇蹇錄」等書，皆日人侵華

之作，書成序言說：「中、日必有一戰，屆時須放棄十餘省以供其佔領，消耗其廣大兵力，俟其疲憊而一舉滅之」。人咸以其謬。後證抗日勝利，終不出此妙策。蔣中正總統對「蹇蹇錄」一書之重視，曾廣為印發，列為國軍軍官必讀書籍之一。

民國十一年，九國會議於華盛頓召開，時北洋政府，尚缺少知日之士，龔氏在日認識王芃生，因反章宗祥故，囑王芃生撰意見書，數走北京力荐王芃生以代己。返國再荐王芃生於魯案交涉督辦王正廷，自身則赴北京從事新聞事業，主編國民外交雜誌（社長劉彥）、東方日報、中美通訊等，言論信實，名震一方。十二年執教於法政學堂，識同鄉成舍我，民國十三年五月與成舍我共創世界晚報，舞其如椽之筆，大貶時政，北洋軍閥官僚對龔德柏及成舍我二人深疾惡之，十月報社被封，五日後復刊，後兼「世界日報」編輯，因撰「亡滿蒙者段祺瑞也」被捕。十四年復獨創大同晚報，言論更為激烈，軍閥恨之刺骨。段祺瑞撤除廢帝警戒，溥儀出走，龔氏以日人必視溥儀為至寶，可用以復滿蒙，大肆抨擊，被拘，後九一八事變，果不出其所料。

龔氏反軍閥、反共產，加拉罕、張宗昌數欲索而殺之，乃南走，抵南京，應陳銘樞之聘，創革命軍日報，蔣中正總司令下野，入申報揭發日本陰謀，並倡中國關稅自主等。皇姑屯事件，為首指控，張學良深受感動

。十八年，龔氏任外交部湖南交涉員，時外人橫行內地，政府力不能及，何鍵主湘，一籌莫展，龔氏僅任八月，解決英商賠償，美領館拆除，日輪碼頭交還等國際棘手懸案。各國領事一一折服，是不戰而屈人之兵，長沙軍民讚口不絕。中俄衝突，龔氏阻周隆光出賣哈長鐵路，九一八前夕，龔氏知日本蠢動，急走告王正廷、陳立夫、張季鸞等人，未及設防，民國二十年九一八後，全國惶恐，龔氏著「征倭論」一書，析長期抗戰必勝之理，並申明此書可自由翻版，志在遍及國人閱讀，堅定人心，聞此書總銷達數十萬冊之多。月餘後，馬占山、張海鵬等予日軍迎頭痛擊，全國振奮，恐日心理一掃而空，厥功甚偉。

民國二十一年初創救國晚報，協助政府抗日除奸，擁護蔣委員長，應政府國是會議之召於洛陽，返京創救國日報，經蕭贊育之薦，晉謁委員長蔣中正於南昌，首陳關漢緬公路計劃，以開抗戰期間戰略物資之通道，受聘為軍委會參議。廿四年當選國民黨五全大會湖南省代表。七七事變，國人奮起擁護政府領導抗戰，日軍進攻南京，出任軍憲警首都軍法執行監，操殺生之權於一身，常為死獄法裏求生之不得，而終夜失眠。法之嚴，心之仁，人權之重，務求其公平而始安心

。民國二十七年奉召參加國民黨臨全大會於武漢，謁委員長蔣中正陳述日本政情，任

主任秘書於國際問題研究所，並以瀘溪故居供作研究所所址。日機轟炸瀘溪，舉家燼毀，蔣中正委員長得悉，月贈研究費伍千元稍舒生計，雪中送炭，畢生不忘。

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外電稱日皇邀宴親華派人物於宮中，龔氏申言日本欲降，感覺怪誕。三十四年，日軍無力再戰，世人不會察覺，四月，龔氏獨行其是，恭陳蔣中正「請速派人赴日召降，保證中國在和平會議中予日人週恤。警惕俄國必然參戰，坐收漁利，為慮更甚。」蔣中正批交熊式輝，熊氏微王芃生意，王謂龔某神經過敏，而擱置之，事遂廢。惟成舍我等深信不疑，報載其文。八月九日俄軍參戰，十日，日本投降，不出龔氏之所料。

日軍投降，應何應欽之聘，隨赴南京受降，備極尊榮，視為終生快事，嗣救國日報復刊，參贊行憲反共，以舊日精神，放言高論，聲播寰宇。三十八年退居臺北，修經史之學，兼涉百家之說，讀書萬卷，過目即能詳記該卷綱要，常愧當年在南京委員長蔣中正每垂詢他的史學地理等問題，未能如在台灣後之廣博而通達。

民國四十六年三月，原任湖南瀘溪國大代表高容行踪不明出缺，龔氏依法遞補為國大代表。一九八〇年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因病逝世臺北，享年九十一歲。

龔氏一生：反日，反俄，反軍閥，反貪污，反共產，爭言論自由，是輿論界之勇士

，政治領袖之諍友，是抗日民族戰略家，自由民主鬥士，是孫文學說的忠實信徒。

龔氏自稱，有三可傳，一為抗日策略，二為治黃（疏導黃河流域）方案，三為不計生死而與軍閥貪污搏鬥，實則龔氏更為新聞記者之典範，值得後人崇佩。遺著有：「日本人謀殺張作霖」、「征倭論」、「中國必勝論」、「中國與世界大戰」、「一九四二年的日本國力」、「空軍足以摧毀日本論」、「日本之末路」、「戲劇與歷史」、「龔德柏回憶錄」、「汪兆銘降敵賣國秘史」，譯注有：「日本對華經濟侵略之過去與將來」（勝田主計著）、「蹇蹇錄」（陸奧宗光著）、「日本侵略中國外交秘史」、「揭破日本的陰謀」、「西原借款真相」等書。（康僑撰）

劉棟材（一九〇三—一九七七）

陸軍一五七師師長

一五八師師長兼羅雲師管區司令

陸軍六十三軍軍長

劉棟材字道中，廣西桂平縣人，一九〇三年七月廿九日出生，父親劉開基，母親黃氏，育有六子一女，棟材居長，早歲入私塾先修館讀書，一九二三年入桂平濤郡中學堂，只讀一個學期即投筆從戎。當時，廣西政局混亂，軍閥各據一方，李宗仁屯兵玉林，以定桂軍司令的旗號（參謀長黃旭初），與

在梧州之廣西討賊軍總指揮黃紹竑（參謀長白崇禧），分進合擊，消滅了盤踞於橫縣、賓陽、貴縣、桂平及平南一帶之陸雲高部約六千人，控制了桂東南精華地區，李宗仁將司令部遷至桂平（李在桂平娶郭德潔），劉棟材族叔劉志忠，是李宗仁部下團長之一，見劉棟材有志從戎，便將棟材安排在團內做軍需。劉棟材被保送廣西南寧軍校受訓，卒業後，回到劉志忠團任排長，不久升任連長，一九二六年初，因軍功升任上尉連長。後又轉入呂煥炎部任營長、副團長。國民革命軍北伐後，一九二八年，李宗仁升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及武漢政治分會主席，一九二九年發生「武漢事件」，李宗仁自南京出走，南下返回廣西，在北平的白崇禧乘輪返桂。

北伐完成，國軍編遣軍隊會議無結果，第二集團軍馮玉祥，第三集團軍閻錫山分別離開南京，汪精衛公開反對蔣介石，第四軍張發奎，率軍自鄂西南下廣西，合組護黨救國軍，自桂出兵入粵，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進攻廣州的桂軍兵敗，退回廣西，當時第四軍軍長李濟琛奉命自粵北上，被幽禁於南京湯山，就任中央所派之廣東綏靖主任陳濟棠，派軍沿西江追擊而上，佔領了廣西玉林及西江下游一帶。在玉林之廣西第一縱隊指揮官呂煥炎反叛李宗仁，擁護中央，被廣東部隊收編。劉棟材從呂煥炎部轉入陳濟棠部李漢魂師充中校副團長。一九三一年，棟材自野戰部隊調至廣州燕塘軍校（校長陳濟棠）

擔任中校教官和中隊長，一九三七年，棟材調回部隊任一六〇師四八〇旅九五九團任中校副團長。

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棟材隨葉肇部一六〇師北上參加淞滬會戰。六十六軍一六〇師一五九師與日敵在淞滬會戰時，反復衝鋒肉搏，傷亡慘重，淞滬戰後，國軍奮戰精神，令人欽佩。上海失陷後，棟材隨六十六軍一六〇師參加南京保衛戰，因招撫傷殘及作戰有功，於一九三八年升任一六〇師四八〇旅九五六團團長。

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間，棟材奉命率領所部九五六團隨六十六軍赴江西南南潯線參加對日軍作戰（即武漢會戰）。在南潯線北段的德安、廖口一帶，棟材曾率部大規模阻擊日軍。武漢會戰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下轄第二兵團司令張發奎，第一兵團司令薛岳，第一兵團下轄第二十集團軍商震、第九集團軍吳奇偉，下轄三十七軍團王敬久、二十九軍團李漢魂，下轄第四軍歐震、第八軍李玉堂、第七十軍李覺、第六十四軍李漢魂。第六十六軍下轄一五九師譚邃，一六〇師葉振中，劉棟材九五六團隸一六〇師。劉棟材所率領的九五六團在南潯北段德安、隘口一帶，曾大規模多次強力阻擊日軍。棟材因戰功晉升一六〇師四七八旅旅長。一九三八年冬，一六〇師調回廣東整訓。棟材任少將步兵指揮官，一九三九年以後，棟材在七戰區

(廣東)四戰區(廣西)對日軍作戰。在廣西戰區，參加著名的崑崙關戰役。

一九四〇年，棟材晉升六十二軍第一五七師師長。次年，奉命赴印度參加盟軍將級班訓練團。回國後，於一九四三年調任六十二軍一五八師師長兼羅雲師管區司令，率部駐廣東信宜、羅定、雲浮、新興一帶。

日軍於一九四四年八月上旬佔領衡陽，九月佔領零陵向桂林進迫。

廣東清遠方面日軍一〇四師團分兩路進攻，佔領梧州，日軍獨立第二十二旅團由開平經新興、郁南與一〇四師團會合於梧州；日軍獨立二十三旅團及偽軍一部同時由雷州北進，佔客縣；一九四四年十月初旬，進出平南、丹竹機場、武林、鎮隆地區後，企圖攻桂平、柳州，棟材在日敵蠢動時率一五八師自新興至羅定阻擊日軍。

抗戰末期，國軍三十師美械裝備部隊訓練完成，計劃反攻廣州迎接美援，一五八師師長劉棟材奉命前進，先在廣東南部陽江一帶進擊日軍，俘獲日軍械彈、馬匹甚多，接受偽軍連長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敵投降，第一五八師裁撤。

一九四七年，劉棟材被送到南京陸軍大學將官乙班受訓，一九四八年四月畢業，被派陸軍六十三軍服務，一九四八年五月，棟材任六十三軍副軍長，配屬黃伯韜兵團，駐軍山東、蘇北與共軍作戰，棟材日夜指揮部

隊作戰，積勞成疾，診治未癒，送往南京休養。

徐州會戰爆發，黃伯韜兵團在碾莊被共軍包圍，黃伯韜自殺殉職，六十三軍在窪灣地區陷入華東野戰軍包圍，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日，六十三軍戰敗，軍長陳章陣亡。

一九四九年一月，劉棟材被任為六十三軍軍長，副軍長郭永鏞，參謀長為棟材陸大同班同學林杞(立法委員林棟的胞兄)。

一九四九年元月十日，徐州會戰結束，棟材剛接任六十三軍軍長即在南京收撫舊部，後調江西吉安整訓，再奉調廣東南雄整訓，又奉命坐鎮粵北曲江，兼任粵贛邊區司令。

一九四九年九、十月間，共軍攻陷了衡陽，華中部隊退回廣西，棟材奉命率領六十三軍自曲江、連縣、梧州、客縣、玉林至合浦。十一、十二月間，六十三軍與共軍激戰於合浦東北之張黃地區，六十三軍及直屬部隊二千餘人戰死，副軍長及兩位師長被俘，棟材在作戰中負傷，棟材輕裝簡從到北海海邊，乘一小艇渡海到海口，在海口醫院療傷月餘後前往香港，繼續療養兼安排眷屬生活。

一九七七年八月，劉棟材在香港病故，終年七十七歲，劉棟材一生，刻苦耐勞，在軍中驍勇善戰屢立戰功，劉夫人林鳳鳴，生子金城、鐵城、大城，女木蘭、碧蘭、美蘭、妙蘭，均有成就，服務社會。(潘桂材撰)

羅剛(一九〇一—一九七七)

羅剛號隱柔，安徽合肥人，一九〇一年生，一九七七年台北病逝，享年七十六歲。

羅剛的祖父羅愛微，父親羅本慶都是鄉里有名望的人物，母親陸氏生他及妹妹警華兩人。小時候在家攻讀詩書，十四歲入浙江永嘉縣第一高等小學，與名將邱清泉同學。由於聰穎好學，成績列全班之冠，被推為級長。

一九一六年十六歲，高等小學畢業，第二年進入南京私立鍾英中學，不到兩年發生「五四運動」，他以二年級級長身分被推為學生會會長，第一次參加愛國活動。

中學畢業時羅剛的學業和操行都是全班第一，後來考入南京金陵大學肄業，兩年後轉到國立東南大學，至一九二八年五月東大改名為國立中央大學，他就成了中大第一屆的畢業生。

一九三〇年政府為培植人才，考選優秀青年出國留學，他報考獲得錄取，與五十多位青年同船前往美國。最初進俄亥俄州立大學肄業，後來轉到哥倫比亞大學，於一九三三年畢業，獲得政治學碩士學位。

二十五歲時加入中國國民黨，致力於民主自由革命救國工作。開始時受軍閥壓迫，後又遭迫害，雖然屢受打擊，但不為威武危

險而屈服。一九二七年因時局動亂曾暫行停學，先奉命任長江江防司令部政治部宣傳科長。後來龍潭戰役國民革命軍獲得勝利，大局安定才回南京中央大學繼續求學，並兼在國民黨南京市黨部服務。

中央大學畢業後，南京安徽公學校長姚文采聘請他擔任訓導主任。安徽省黨部改組，中央派他為蕪湖市黨部組織部長，整理地方黨務。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留學美國期間，中央任命他為駐紐約美東支部執行委員，推動海外宣傳工作，並策劃籌辦「中國日報」，主持筆政，以羅百鍊筆名與左派人士筆戰兩月，將陳春圃主持的「民氣報」打垮。日本軍隊侵犯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時，他發表文章，號召華僑參加救國運動，致使羅百鍊的名字，深深地刻在華僑們的心中。他自己也認為這是一生最感快慰的工作。

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由美國轉往歐洲，考察英、法、比、德、義、瑞士等國的政治設施，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回國。他一向喜歡買書，在留美期間，節衣縮食，買了一千多冊的書刊，全部攜帶返國，在我國留學生中，有這種雅好的並不多見。

一九三三年秋中央派他為宣傳部設計委員，十一月調派為剿共宣傳大隊主任，完成任務後奉派擔任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影檢四年，對中國電影事業基礎的奠立與發展，有很大的貢獻。

一九三七年七月對日抗戰爆發後，隨國民政府遷往四川，潛心理論研究工作，先完成撰寫「中國外交政策」一書，澄清誤解，為國宣傳。

由於這本書的撰寫，得深入研究孫中山的思想理論，又蒙蔣介石主席召見嘉許，於一九三九年五月又完成他的重要著作「孫文學說的體系與原理」。這本書出版後，受到廣泛的重視，國立政治大學特聘他為教授，專講「孫文學說」一課。

一九四三年奉命擔任中央宣傳部普通宣傳處處長，曾數度蒙蔣介石主席召見，並接受他的建議在抗戰勝利前革新改進黨政。

來台後歷任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國立台灣大學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化大學、東吳大學及其他各大學研究所兼任教授；博士、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國防研究院講座。教學之餘，又勤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重要著作有：(一)中華民族主義運動與台灣，(二)國父孫中山實錄，其他有關學術論著，時常發表在各重要刊物及報章中。

羅剛一生淡泊名利，唯道是從，所以他對新中國的建設真理的探討，都從遠大、精深的處入手。秉性剛直、不伎不求，存誠無私、嫉惡如仇的個性，更顯示了他高潔的風範。

羅剛夫人范博理，新中國大學畢業，信基督教，歷任教職，對羅剛的生活起居都能悉心照顧，對他的研究著述，幫助很大。女

兒羅紹岩留學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在美國大學任教，很受到學生的敬愛。(姚蒸民撰)

馬鴻逵（一八九一—一九六九）

寧夏省政府主席
甘肅省政府主席
國民大會代表

馬鴻逵字少雲，甘肅臨夏人，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生，父親馬福祥字雲亭，曾任青島市長，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鴻逵入蘭州甘肅陸軍小學，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在寧夏任營長職，奉令往甘肅南部一帶進剿由河南竄擾甘肅之白狼匪部，以地形不熟，被匪包圍，但以英勇善戰，反獲大勝，收匪患肅清之功。

民國四年至民國九年，馬氏在北平任總統府侍衛武官兼領寧夏新軍統領等職。民國九年在綏遠任第五混成旅旅長，民國十三年調駐寧夏。十四年改編為西北軍第七師，任師長。十五年冬，奉命領軍援助陝西，任第四路軍總司令。十六年夏，北伐軍抵達河南，西北軍由潼關出兵，直趨洛鄭，會師中原。馬氏於此時隨軍東下，任第二方面軍第四路總指揮，並兼任第十七師師長，閻關長征，頗著勳勞。北伐完成後，所部改編為國民

革命軍陸軍第六十一師，仍任師長。十八年夏升任第十一軍軍長，同年底又升任第十五路總指揮。十九年任津浦線國軍總司令，不久仍歸原建制。

民國二十二年所部開往寧夏，馬氏兼任寧夏省政府主席，以迄民國三十八年，抗戰爆發後所部擴編為十七集團軍，任總司令兼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抗戰期間所屬軍隊駐防綏西前線之狼山烏拉山一帶，與敵廝殺血戰，八年如一日。勝利後改兼西北行轅副主任兼寧夏省保安司令。

馬氏主政寧夏十有餘年，其施政方針以

- (一) 編組保甲。
- (二) 清丈土地。
- (三) 整理金融。
- (四) 發展水利。
- (五) 提倡工業。
- (六) 振興教育為中心。

民國三十一年蔣委員長中正飛抵寧夏視察，對各項政績，均備加贊許，尤以清丈土地，編組保甲，濬渠道林等為最。

事後馬氏告誡他的部屬謂：「我埋頭努力十年，了解我的並不多，今天得到了最高長官的獎許，我心裏非常感激，同時也非常惶恐！從今以後，要更加努力，以上答蔣中正委員長殷切的期望。」這一段話，可充分表現他實地苦幹的精神，和勇往進取的決心。

馬氏為虔誠回教徒之一，同時亦為倡導回教革新運動，以發揚光大回教教義與回教精神之巨人。此種革新思想，在西北回教同胞中，尚不多見。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在寧夏省政府紀念週，馬氏發表了一篇有名的「西北回漢問題之解剖」講演詞中，首先指出：「回漢都是中國人，並且都是中華民族，本為一體，無畛域之分，不過是信奉伊斯蘭教與不信奉伊斯蘭教的一點問題。」這予挑撥分化民族感情者，以當頭棒喝。

繼稱：「中國自五四運動後，受了新思潮的激盪，文化走上了新的道路，一切都隨著世界潮流而轉變了。惟有伊斯蘭教的教徒，尚未受新文化的洗禮，絲毫無一點反應，仍然墨守舊習，沿用成規，頑固不化。一般阿訇（唸經人），關起大門唸經，口中七說八道，誠恐教外的人聽得了甚麼秘密似的。他們還未將伊斯蘭教的意義弄明白，把教的範圍看得太狹太小，從未將教的宗旨，給教外的人解釋，使社會一般都了然教的內容。所以這些年來，伊斯蘭教雖然盛行，然教外的人都不明瞭其真諦，無怪發生猜疑和誤會。」

又稱：「一般唸經的阿訇，差不多都未讀過中文，對於普通的常識，現代的一切，都茫然無知，不但中文未通，還有很多未把阿文意義及經典內容弄通的，他們對教徒講

經的時候，穿鑿附會，曲解誤解的地方很多。如從前穆聖在戰事時期，鼓勵教徒奮鬥犧牲，爭取最後勝利的話，就誤為「殺敵人可上天堂。」以這樣博大精深的教理，讓這些不通半通的人講，怎樣能夠發揮盡致，闡揚光大呢？由那些誤解的結果，所以就發生許多不幸的事件，和回漢間的隔閡，實在傷心啊！」

回教與非回教，祇有信仰之分並無種族之別；回教須隨時代而進步，回教教義須使教外人普遍的了解與認識；回教教典，須有精深的研究與正確的詮釋。諸如此類的講詞要義，皆屬明達切要的見解。

民國三十六年馬氏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到首都南京出席，貢獻良多。民國三十八年六月，調任甘肅省政府主席，三十九年五月赴美就醫，於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年）一月在美病逝，歸葬臺北，享年七十八歲。

監察院新疆監察使羅家倫博士，於一九四三年赴西北各省考察，至寧夏時，曾賦贈馬鴻逵詩云：

賀蘭山勢壓邊塵，
崖石丹如報國心。

信是中朝成一統，

黃河水似鑑湖清。

此寥寥二十餘字，寫實寓意，可將馬氏事功風格，概見一斑。（陳亞芳撰）